

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

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人力资本形成的效应探析

张永丽, 刘富强

(西北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文章利用在西部地区8个样本村调查所获得的资料, 对比分析了农村外出打工者外出前后自身变化, 说明了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研究表明,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劳动者本身人力资本的形成存在着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 在当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相对有限的情况下, 发挥流动对人力资本的正面作用对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现状至关重要。

关键词: 农村; 劳动力流动; 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0) 01-0027-07

The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the Flowing of Rural Labor Force on the Human Capital Formulation

ZHANG Yong-li, LIU Fu-qiang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investigation material of 8 poverty villages in western area of China, this paper compared the changes of before and after going out for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It also indicated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stock from the labor force flowing to the labor for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lowing of rural labor force ha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n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relatively limited human capital in rural areas, the positive impact played a vital role of improving the situation of rural human capital.

Keywords: rural; labor force flowing; human capital

在人力生产、健康、教育、培训、就业迁移等方面的支出及其在劳动力身上的有效凝结, 都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 不仅对农村的收入结构与经济结构产生了较大影响, 同时也对流动者自身人

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产生较大影响。针对这一问题, 国内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诸多研究。侯风云从人力资本形成的角度, 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对其人力资本形成有着积极影响^[1]。侯力从区域人力资本平衡角度, 认为劳动力流动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

收稿日期: 2009-08-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BJL026)的资助。

作者简介: 张永丽(1966-), 女, 甘肃会宁人, 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 主要从事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

形成与优化配置,虽然使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人力资本方面产生巨大的差距,并影响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有利于提高欠发达地区对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2];任新民认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正表现出人力资本化的趋势,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3]。刘文则从人力资本的产权制度、投资制度等方面入手,认为合理的制度安排能为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诸多保障,同时也为微观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提供激励和动机^[4]。

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学术界关注到了劳动力流动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对流动者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并从微观角度分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劳动者自身人力资本形成的积极影响,但由于受调查资料、研究对象等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对诸如流动者的技术积累、流动对教育的替代等问题尚未进行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也仅以感性描述和调查报告的形式为主,缺少规范的实证研究。

为进一步分析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劳动者本身人力资本形成带来的影响,本课题组于2007年底到2008年初,组织西北师范大学“三农”问题研究社的成员和区域经济学的部分研究生,在甘肃、宁夏、四川、陕西等地进行了第二次社会调查。调查随机选取了劳动力流动比较普遍的8个外出者样本村,通过随机抽样在每村选取了50户农户,并以面对面访谈形式完成问卷350份,有效问卷306份,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241户,没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65户;调查涉及306个样本农户的1426人,910个劳动力,其中纯打工者331人,农业兼打工者104人,打工人员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47.80%。该研究主要利用这次调查所获取的资料数据,通过对外出户与非外出户、外出流动人员外出前后自身技能素质、从业竞争力等方面的对比分析和实证分析,考察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

一、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基本特征及人力资本状况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流动劳动力呈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和趋势,如年轻化、男性和未婚

者居多、受教育水平相对整个农村劳动力来说比较高等^[5-6];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比如流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女性流动者所占比例有所增加,年轻一代流动者流动的稳定性在不断增强等^[7];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相当部分农民工的“回流”现象更是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本调查显示,就受教育程度来看,农村外出流动劳动者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非外出劳动者,外出劳动者的文盲比例比非外出劳动者低17.90%,且外出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非外出劳动力多2.77年;就年龄结构来看,外出流动人员以中青年劳动力为主,而且男性的平均年龄要远大于女性,在本次调查的435个样本中,外出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5.09岁,其中男性为34.1岁,女性为26.4岁,40岁以下的人员占62.45%;就性别特征来看,外出流动者以男性为主,占外出者比例的78%,几乎是女性的4倍;就婚姻状况而言,已婚外出者要高于未婚者,这主要是由人口的年龄结构所引起的。从就业的行业分布特点来看,大部分外出流动者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与餐饮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等部门,主要从事建筑工人、服务员、零工等职业,少数从事有一定技术性 or 管理层职业的流动劳动者多是具有多年外出经历或接受过较高教育的外出者;从整体收入水平看,外出打工者的收入明显高于非外出者,但与城镇居民相比依然较低。同时,从收入的年龄结构来看,外出流动者收入与年龄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曲线关系,即收入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在达到一定年龄阶段后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见表1、表2、表3)。

二、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人力资本形成的积极影响

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本的形成是一个相互交织的过程,流动者需不断积累经验,最终使人力资本趋向成熟。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状况下的农村劳动力来说,外出流动过程中的职业培训、“干中学”等因素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不仅因为流入城市后,增加了流动

表 1 外出流动者和非外出流动者的特征比较		
	非外出劳动力	外出劳动力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4.58	7.35
受教育程度（%）		
文盲	21.14	3.24
小学	44.77	33.81
初中	25.68	47.84
高中及高中以上	8.41	15.11
家庭平均收入水平（元）	3964.87	6702.98
家庭平均农业收入（元）	8836.34	6054.13
家庭平均教育投资（元）	5277.14	3380.82
	非外出户	外出户
样本数（户）	65	241
户均人口（人）	4.65	4.77
户主平均年龄（岁）	46.00	45.63
人均收入（元）	2875.39	3264.76
其中 农业收入	1328.88	887.92
打工收入	38.24	1900.29
其他收入	1508.28	476.55
户均支出（元）		
总支出	23711.43	12964.07
消费性支出		
吃饭	3039.57	3451.42
孩子上学	5277.14	3380.82
吃药	514.57	748.58
生产性支出		
农业投入	3841.57	1525.14
非农业投入	10162.86	1608.22
其他	867.14	2249.91

表 2 外出流动者的基本特征			
年龄（岁）	25 以下	25 ~ 40	40 以上
样本数（人）	129	143	163
性别比例（%）			
男	63.12	84.27	83.65
女	36.88	15.73	13.46
已婚比例（%）	16.67	80.9	85.58
平均年龄（岁）	21.73	31.52	41.83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8.77	7.46	6.04
年均外出时间（月）	9.95	9.25	8.26
换工作频率（次）	3.63	3.12	1.42
外出前培训比例（%）	14.29	22.47	25.96
年收入状况（元）	9347.62	10843.82	5723.08
外出打工去向（%）			
省外大城市	71.43	73.03	61.54
省内大城市	15.48	8.99	19.23
县城	11.90	16.85	16.35
附近的镇	1.19	1.12	1.92
本地乡镇企业或 个体私营企业	0	0	0.96
打工者自身的变化（%）			
思想观念更开放	61.90	68.54	58.65
生活方式变化	51.19	61.80	32.69
增长见识	45.24	34.83	19.23
收入增加	26.19	19.10	16.35
有新的追求	16.67	7.87	3.85
学到新知识和技术	10.71	13.48	3.85
无变化	0	1.12	1.92

注：已婚男性所占比例为 70.37%，已婚女性所占比例为 37.12%；男性平均年龄为 34.12 岁，女性平均年龄为 26.41 岁。

表 3 外出流动者从事行业情况								%
打工者 职业分布	采矿 业	服务 业	商务 服务	制造 业	运输 业	建筑 业	临时 工	
比例	16.92	6.16	0.00	9.24	3.08	33.84	30.76	

者发挥人力资本潜在优势的机会，而且流动本身也形成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能够增加我国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和收入^{〔8-9〕}。本调查显示，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人力资本形成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提出一定要求

调查表明，影响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最重要的因素是劳动者的个人素质。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低收入的传统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高工资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必须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本**，才能满足流入产业部门的要求。

本调查资料显示，小学以下文化水平的外出劳动者人均年收入为 6898 元，相比而言，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外出者的人均年收入为 9417 元；外出前受到培训的外出者人均月收入为 1212.07 元，高于未接受培训的外出者人均月收入的 1138.8 元；同时，收入与外出流动者年龄存在明显的倒 U 型曲线关系，究其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出劳动者在务工过程中个人的阅历、知识、经验等日益丰富，人力资本存量逐渐增加，其收入也相应得到提高。但是，与年轻劳动者相比，老年劳动者在体力、观念以及知识更新速度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因此等达到一定年龄后，他们的收入会呈现下降的趋势。此外，受教育程度较高或者接受过培训的流动劳动力对行业角色变换的适应速度快，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容易找到报酬较高的工作。

表 4 样本数据外出者培训状况及影响		
	外出前接受 培训者	外出前未 受培训者
比率（%）	20.63	79.37
平均月收入（元）	1212.07	1138.88

2. 新型的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方式——“干中学”

阿罗提出的“干中学”概念中，肯定了

技术具有外部性，即知识的溢出效应，认为“干中学”会引起人力资本水平的相应提高，这在我国农村流动劳动者身上也得到了体现。

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外出前接受过相关职业培训的流动者只占 20.63%，40% 的流动者外出务工遵循的是“零工—小工—大工（技工）”这样“边干边学”的路线。调查还发现，外出者的务工时间与其技能水平成正比。样本显示，在外出前有技术专长的外出流动者中，大多是 25 岁以上有过外出经历的流动者，25 岁以下的只占 20.34%。在外出者外出后自身变化的选项中，虽然只有 22.5% 的外出者明确表示在外出打工过程中“学到了新技术”，但从外出者务工经历来看，大多数有外出经历的劳动者都实现了“零工—小工—大工（技工）”的转变。而且，厂商等相关组织即是“干中学”的平台，流动劳动者无需支付直接成本，所以“干中学”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对人力资本积累决策的约束较松，在技术水平要求较低的行业中尤为如此。

3. 流动收入减轻了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的支付约束

人力资本投资依赖于收入水平的高低，而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平衡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难以替代的方式，本调查数据显示，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人均收入为 3264.76 元，而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人均收入为 2875.39 元，而且打工收入是前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后者主要依赖农业和非农经营收入，并且受地方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非农经营者及其经营收入都十分有限，可见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村地区大部分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对外出劳动者外出后的生活状况调查显示，有 76.36% 的外出者表示“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从我国农村目前的教育情况看，教育的机会成本很高；从农村的生活水平看，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娱乐设施贫乏，而外出流动劳动者通过进城务工增加收入，可以极大提高健康、教育、相关培训的支付能力以减轻人力资本投资的支付约束。对有外出人员的样本户调查访问发现，外出劳动者每年人均带回家 6476.92 元，这部分现金大多用于改善家庭生

活的开支和农业投资上。比较发现，外出户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和人均健康消费都高于非外出户的水平。

另外，一方面相对于闭塞的农村，城市人口集中，信息较多而且传播较快，有利于进城流动人员及时了解职业或者岗位要求，进而有目的、有方向地择业或参加相关职业培训；另一方面相对于农村，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比较成熟，农村外出劳动者搜寻工作、变迁职业等的择业成本较低，有利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

4. 流动过程促进流动者思想观念的更新

研究饥荒和贫困问题的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根源是基本能力的剥夺和机会的丧失^[10]，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表现为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慢性流行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方面的失败等。现今社会的贫困已不再单纯指经济贫困，它的内涵被丰富了，其中一个方面是人文贫困。人文贫困既是收入贫困的结果，又是收入贫困的原因，人文贫困不仅影响个人人力资本的形成，对农村发展的影响也是根本性的。如果不解决人文贫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就受到极大挑战。

优化人的知识结构对缓解人文贫困具有决定作用，而知识体系又受到个体所生活的周边环境的强烈影响。我国农村的封闭、落后导致农民普遍文化知水平偏低，创造和获取技术、信息的能力不足，限制了农民综合素质和自主脱贫能力的提高。目前，进城打工者多为农村劳动力中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那部分人群，因而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较强。进城后，农村流动劳动者追求现代化的强烈心理极易受到城市中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农村劳动者的外出就业不仅提高了他们对城市生产、生活的适应能力，更重要的是，流动过程中各种新鲜经历增强了农民的现代化意识，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传统思维定式。

调查样本显示，在 435 名外出者样本中，对于打工后自身的变化，有 62.81% 的外出者表示“思想观念更加开放”，有 32.13% 认为“增长了见识”，有 9.03% 选择“有新的追

求”，这表明流动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在流动打工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和提高，外出流动对缓解“人文贫困”有着积极的影响。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流动者人力资本形成的消解

劳动力流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人力资本的形成，但是长期以来“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对劳动力市场的分隔，不仅对劳动力市场的合理竞争和劳动力的有效流动带来极大影响，而且使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的提高受到影响，对流动过程中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消解作用。

1. 城市就业的边缘化，不利于流动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增加了劳动者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流动的成本，降低了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正规部门的可能性，使农村流动劳动者向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与餐饮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集中，这些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差，对劳动者的文化程度要求不高，但工作量大，用工时间长，使得流动者没有足够精力再去学习其他的技能或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于是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流动劳动力的素质低下，导致他们进入城市就业的难度加大，被迫选择从事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工作，限制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于是流动者在城市的就业机会变得更少，进入城市就业的难度更大。对样本村的调查资料也显示，只有 22.5% 的外出劳动者“学到新技术”，大多数外出劳动者的工作只是简单的重复性劳动，这非常不利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形成。

从样本村的调查数据看，91.74% 的外出劳动者的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下，大多数外出者的收入水平相对低于城市职工。据专家估计，国企职工比农民工的工资高 32%，如果包括他们所有的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物质福利，这一数字差距将高达 127%。显然，这不利于流动劳动者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也难以保护自身已形成的人力资本。

2. 城市生活的边缘化，不利于流动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有机整合

虽然农村到城镇的移民数量在逐年增加，但制度性的迁移障碍仍然存在。在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约束下，流动劳动者即便进入城市，也处于一种“进而不融”的尴尬状态，城市对这部分“非正规”流入城市的劳动者存在各种歧视，将其排斥在正常的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之外，农民工被迫成为游离于城市和农村的双重边缘人。

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组调查显示，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大多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基本上没有和本地居民形成共同的生活圈；而且 50% 以上农民工工作之余的主要休闲方式仅为看电视、睡觉、看看书报等，几乎没有其他娱乐活动。根据我们对样本村外出人员的访谈，在外出过程中，没有一人去过务工城市的中高档大商场，生活用品一般在地摊或者小卖部购买；生病一般是自己买药或者去邻近的社区小卫生所；工作闲暇之余基本上看电视，打牌等。这种虽处在同一城市，生活却分割开来的状态，极大地阻碍了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融合，著名的北京“浙江村”就是一个佐证。

3. 流动的不稳定性提高了流动成本，减少了人力资本的投资机会

首先，农村流动劳动力处于城市的边缘，常常遭受不公平待遇和歧视，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就业地位，失业的风险远远高于城镇居民。他们改换工种的次数频繁，有的失业者甚至只能通过暂时打零工的形式维持生活，而且在寻找新工作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必要的搜寻成本。从短期看，更多的岗位更换有利于劳动者在“干中学”中积累职业技能和经验，但从长期考虑，这不利于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形成。一方面，劳动者在变换工作过程中，可能中断对正在适应中的技能的学习或者荒废其已有的技能；另一方面，适应新岗位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中间也浪费了一部分人力资本。其次，职业的不稳定性容易导致流动劳动者为寻找新工作而四处奔波，加重了他们在交通、住宿等方面的负担；而一旦找到新工作，很有可能需要从原居住地搬迁到离新工作地点较近的区域居住，增加了他们的搬迁成本，特别是夫妻双方工作地点不一致的情况，往往以

牺牲一方放弃现职工作作为沉重代价，家庭人力资本流失严重。另外，外出流动劳动者中短期或者季节性外出务工人员占很大一部分，“候鸟式”的流动方式，使他们周期性地来回于城乡之间，不仅增加了他们的迁移成本，又耗费着他们的时间成本。再次，外出流动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上也不固定。有的用工企业为了追逐利润，强迫员工加班加点，扰乱了他们正常的生活安排；而且长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容易引发疾病，严重威胁着农民工的健康。总之，流动的不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他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从而极大减少了进城流动人员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样本数据显示，435名外出者样本中，一年中平均外出时间只有9个月，且一年内换过2次或2次以上工作的占40.86%，这表明流动劳动者的工作稳定性比较差。

4. 流动的低龄化使流动对教育产生了很强的替代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虽然在增加收入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又与个人继续接受教育相矛盾，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替代效应。一方面，年轻劳动力的适应性就业在短期内迅速改善了家庭贫困状况；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部分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收入的机会和能力将逐渐萎缩而最终被新生代所取代，其后代也很容易因父代在就业市场中的不利境况而丧失较好基础能力的培养机会，引发贫困的“代际传递”。

流动对教育的替代效应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流动人口的低龄化现象。外出流动者低龄化实际上是一种适学人口放弃继续接受教育的反映。调查数据显示，就小学教育来看，流动户和非流动户子女的就学率都为100%；就初中教育来看，流动户子女就学率为98.54%，非流动户为99.31%，流动户低于非流动户0.77个百分点。就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就学率来看，流动户与非流动户之间有略微差别。较大的差别出现在17岁以上的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外出户17~19岁阶段高中适学子女的就学率为83.78%，非外出户为86.67%，外出户低于非外出户2.89个百分点；20岁及

以上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则差别更大，外出户为42.16%，远远低于非外出户的83.33%。而外出户23岁以下年龄段人口的流动比率为36.15%，非外出户为17.86%。由此可见，在流动户与非流动户子女就学率之间出现这种差距的原因特别明显，那就是流动的低龄化对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有明显的替代效应，也就是说在这一年龄段的人口主要有两种选择：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在校读书。如果说这种替代在初中阶段已经出现的话，那么在高中和高等教育阶段则十分明显。

四、基本结论与建议

首先，劳动力流动对劳动者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大量流动劳动力的存在，迫使流动劳动者为增强其自身竞争力而不断提高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要求，并通过在“干中学”的形式逐渐积累技能和经验，减轻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支付约束。同时，在这一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积极的现代价值理念又可以反过来影响劳动者的决策行为，促进人力资本的高效形成；另一方面，流动过程中也存在某些制约劳动者人力资本形成的不利因素，包括外部和内部的。外部影响如城市就业和生活的边缘化，容易降低流动者发挥人力资本优势的信心；内部影响主要表现为流动的不稳定性和流动对教育的替代效应，它们增加了流动者的个人负担，同时也阻碍人力资本的有效形成。

其次，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还不够充分。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庞大，在数量上形成了强势，但在质量上却缺乏明显的优势。流动劳动者本应在流动过程中不断地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和学习，迅速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然而，地域、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因素，限制了流动者个人的快速发展，也限制了流动者人力资本水平的充分发挥。

再次，流动劳动者尚未充分认识主动积累自身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在流动过程中，劳动者经常为达到工作的应聘条件，被动地提高自身劳动素质，付出较大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

本。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积累的迟滞不仅容易使劳动者失去较好的就业机会,就长期来看,也不利于保障个人就业的稳定性,不能适应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因此,为打破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约束,促成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有效提升,应尽快合理地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政策性障碍,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政策,给予农村外出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平等竞争的权力,逐步扩大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保证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应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鼓励农村家庭对教育的投资,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他们未来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 侯风云.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效应探析 [N].

光明日报, 2000-02-05.

[2] 侯力. 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形成与配置的影响 [J]. 人口学刊, 2003, (6).

[3] 任新民.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的人力资本趋势分析 [J]. 思想战线, 2003, (5).

[4] 刘文. 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效应研究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4, (5).

[5] 蔡昉, 白南生. 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6] 张永丽, 黄祖辉. 新一代流动劳动力的特征及流动趋势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8, (1).

[7] 张永丽, 杨志权.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农村流动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影响 [J]. 西北人口, 2008, (2).

[8] 蔡昉, 人口转变新阶段与人力资本形成特点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1, (4).

[9] 朱农. 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10] 阿玛蒂亚·森, 王宇等译. 贫困饥荒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责任编辑 童玉芬]

(上接第 14 页)

参考文献:

[1] Bloom, D. E. and J. G. 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 12.

[2] Higinist, M. and J. G. Williamson. Age Structure Dynamics in Asia and Dependence on Foreign Capit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7, 23.

[3] Romer, P.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y, 1990, 98.

[4] Grossman, G. M. and E. Helpman.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MIT Press, 1991.

[5] Barro, R. J. and X.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McGrawHill, 1995.

[6] Yamaguchi, M. and H. Binswanger. The Role of Sectoral Technical Change in Development: Japan, 1880-1965.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75, 57.

[7] Young, A. Lessons form the East Asian NICS: A contrarian view.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4, 38.

[8] Lin, T. C.. Education,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Case of Taiwan,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3, 22.

[9] Lin, T. C.. 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Study of Taiwan Case.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4, 15.

[10] Chow, G.. Accounting for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 30.

[11] 同 [1].

[12] Yao, W. J., Y. C. Hsieh and S. Y. Hamori. An Empirical Analysis about Populati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Economics Bulletin, 2007, 15.

[13] Granger, C. W. J..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Concept of Causality.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88, 39.

[14] Hamori, S. Y..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Business Cycles Among Germany, Japan, the UK and the USA. Applied Economics, 2000, 32.

[15] Toda, H. Y. and T. K. Yamamoto. Statistical Inference in Vector Autoregressions with Possibly Integrated Processe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5, 66.

[16] Johansen, S.. Likelihood-based Inference in Cointegrated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7] Connolly, M.. The Dual Nature of Trade: Measuring its Impact on Imitation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 72.

[18] 同 [12].

[19] 同 [6].

[责任编辑 肖周燕]